

石泉先生的学术师承与学术成就

武汉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

石泉先生原名刘适,字蘧孙,1918年1月出生于北平,祖籍安徽贵池。今年是石泉先生80寿辰。1998年1月7日和9日,武汉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成员、石泉先生及门弟子和武汉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部分教师先后举办两次学术座谈会,回顾石先生的学术渊源,总结探讨石先生学术成就与治学方法。现将有关内容综述如下。

一、师承与渊源

石先生的学术思想与治学方法的渊源,大致可分为五个阶段,现按时间顺序阐述如次:

(一)读高中时,石先生就被顾颉刚、钱穆等先生在中国上古史和历史地理方面针对流行说法找出矛盾、敢于怀疑并寻求新解的大胆探索精神所吸引。顾和谭其骧先生主编的《禹贡》杂志以及顾等主编的《古史辨》、钱穆所著《国学概论》和《先秦诸子系年》等,都曾使他受到很多启发。此后,每遇到问题,常喜欢多问几个“为什么”;面临矛盾难解之处,就更不肯轻易放过,总想探明究竟,弄清真相。这种敢于怀疑的大胆探索精神,一直影响至今。

(二)1937年夏,抗日战争爆发,北平沦陷。1938年秋,石先生进入当时被称为“自由孤岛”的北平燕京大学。在历史系,他首先认识了侯仁之先生(当时是研究生)。侯先生是最早向石先生系统介绍历史地理学内容的前辈,他以自己的科研实践,告诉石先生怎样观察历史时期的地理变化,还引导石先生以济世益民的目标从事学术活动。随后,石先生从二年级起,选修洪业(煨莲)先生的“史学方法与实习”和“远东史”两门课。前者内容主要是史料学的原理及其应用。后者则是体现前者的历史例证。由此,石先生开始初步受到史料学方面严谨、细致、扎实的认真训练,以及考证、鉴定史料并从中提炼史实的科学方法。此外,北平燕大当时还有几位中年教师也使石先生深受教益,如聂崇岐先生的“宋史”、翁独健先生的“远东史”(不同于洪先生,各有特色),都是建基于洪先生的史料学训练,同时又从史实上升到史识。听他们的课,也都使石先生有耳目一新之感。

(三)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北平燕大被日寇封闭。1942年秋,石先生从江西兴国的中学岗位上回到刚复校于成都的燕京大学继续学习。这时,他有幸受教于先后来校任课的徐中舒、陈寅恪两位名教授,徐先生讲授商周史、明清史与历史地理课。在方法上都是直探本源,运用最接近于当时的原始材料。例如:讲商周史,主要依据《尚书》、《左传》等

古籍中的最早记载，包括甲骨文、金文有关材料，探讨古史中许多难于索解的问题，并经常用一些接近于上古社会形态的西南少数民族社会调查材料，以之与商周古史相印证，来解释先秦古代社会的某些体制；讲授明清史则用了不少“内阁大库档案”中前人未见的史料；讲历史地理则跳出传统说法，依据更古的史料，得出全新的见解，使石先生受到极大的启发。后来，石先生的本科毕业论文《春秋吴师入郢地名新释》即由徐先生指导。这篇完成于1944年的本科毕业论文，从最普通、常见的史料出发，经过分析，找出矛盾，作为突破口，进而得出新解。此后，不断修改补充，终于成为《古代荆楚地理新探》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四）使石先生受益最大的，莫过于听陈寅恪先生的讲课和阅读陈先生的专著所得的收获与启迪。早在1943年，陈先生初到燕大，石先生即慕名前去听他先后开设的魏晋南北朝史和唐史课，深感所讲每一史事都有新义，特别是陈先生屡次从常见史料中发现重大问题，提出使人感到意外而细思又理所当然的全新见解，体现出卓越的学术洞察力与高度启发性。也在此时，石先生先后读了陈先生的《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和《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以及随后出版的《陶渊明之思想与清淡之关系》。其中成系统的精辟创见，把石先生的眼界、思路又引入到更高的层次，从而奠定了他终生治学的志趣。1944年9月，石先生考入研究院，成为陈先生在成都燕大录取的唯一一名硕士研究生（当时中国的大学只能招硕士生，博士生不被国际学术界承认），这时又听了陈先生新开的晋至唐史专题研究课。以后，在陈先生住院治疗眼疾期间，石先生经常陪伴，聆听教诲，就更多地体会到陈先生治学的博大精深与中西兼通的学术气派。而石先生的硕士论文题——《中日甲午战争前后之中国政局》亦于此时与陈先生商定。这里应指出，无论是本科毕业论文还是硕士毕业论文，题目都是石先生自己拟定的，这也是徐、陈二先生一贯作风，认为写毕业论文是科研的开端，学会了选题，本身就是一次重要的科研训练。石先生后来带硕士生和博士生，也都一直坚持这种作法。

这一篇中国近代史硕士论文（也是陈先生指导的唯一一篇中国近代史论文），是在二战结束后，陈先生出国医治眼疾无效，又重返清华大学任教，并兼北平燕大研究院导师期间指导石先生完成的。陈先生在指导的全过程中非常认真、严谨，要求必须充分占有史料，以期弄清史实。为此，石先生曾多次去故宫博物院查阅晚清同、光两朝的军机处档案抄件以及“留中”未发的摺、片等。陈先生很重视史识，但要求必须立足于史实，对石先生提出的分析性见解，则经常从反面质疑，必至无懈可击，始予首肯。为此，虽曾使石先生当时为难，但事后深感大有教益。总之，陈先生通过指导论文，处处要求言必有据，立论务求实事求是，不尚空谈。这些方面，石先生虽在前几阶段已受到一些启发与训练，但如此全面细致，一丝不苟的检查、把关，尤其是在陈先生更为突出的学术洞察力的指引下，就更使石先生感到通过论文实践所得收获之大。前已学到的诸师之长，至此乃更得洗炼与升华，可以说是在渊源方面已得兼综，并通过这次写作中国近代史论文的全过程，更加具体化了。

（五）还在解放以前，石先生就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解放后更是系统地钻研学习。这是在石先生学术渊源中知之较晚的一项系统认识，但又是使他在思想认识以至世界观、人生观方面发生根本性转折的重要因素。在石先生长期教学、科研生涯中，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一直起着重大的理论指导作用。

二、成果与前景

石泉先生在历史地理方面的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领域:

(一)先秦至齐梁时期的荆楚历史地理。这是石先生几十年来用力最勤、成果最多、历时最长、牵连最广、有重要突破、同时也是最引起争论的研究领域。这方面的研究成果集中体现于《古代荆楚地理新探》(武汉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和《古云梦泽研究》(与蔡述明先生合著,湖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两部专著及一系列论文中。

《古代荆楚地理新探》包括石先生历年所作13篇论文,是一部以论文集形式出版但又互相呼应、成一整体的学术专著。前有一篇5万余字的“自序”,扼要介绍了13篇论文缘起、内容与特点、所用方法以及今后的学术前景,实为点睛之作。传统的关于古代荆楚地理的解释,是以断定先秦楚郢都、秦汉至齐梁江陵城在长江北岸、今湖北荆州市(原江陵县)境内为核心的。这个观点自唐初《括地志》以来,历时已千余年,久被视为定论,并逐渐形成庞大的解说体系。石先生以先秦至六朝的材料为主要依据,大幅度订正了唐以后至清代盛行的传统流行说法,通过严密细致的考证,结合实地调查,对古代荆楚地区的一系列古地名逐一重新定位,得出一系列另成体系的新解,其核心是:楚郢都及其后继城市秦汉至齐梁江陵城,并非如传统说法在今长江边江陵县,而是在汉水中游以西、蛮河下游今湖北宜城市南境;与此相应,古荆楚地区一系列著名山川城邑,也都在汉水中游两岸的宜城及钟祥两平原上。

在《古云梦泽研究》(上编)中,石先生在考察古文献中有关云梦的一系列记载,进行了认真细致的分析,使之恢复各自的本来面目之后,发现:前人对古“云梦”地望的解释,因时而异,有一个演变的过程。从较古的原始材料看,古代云梦泽实际上并不像后人所说的那样大;不同历史时期的云梦泽也并不是始终位于同一地点,而且同一时期也往往有不止一处被叫做“云梦泽”的地方,但通常只有一个较为著称。自唐以后,由于人们企图按照当时人的传统解释(包括未能鉴别以伪乱真的史料而造成的误解),以兼容并包的方式来调和有关云梦泽地望的各种矛盾说法,遂致把云梦泽越说越大,形成“跨江南北”的大云梦泽说,并逐渐成为最流行的说法。此说赖以成立,有两个前提:一是误以为古文献中的“江”专指长江;二是误以为古文献中的云梦泽只有一个。石先生通过对古文献的细密考证分析,不仅指出古文献中“江”不是长江的专称,而且还否定了伪杜注“跨江南北”的大云梦泽说的存在,与蔡述明先生在该书下编中从历史自然地理出发所得出的结论,殊途同归,相得益彰。

石先生关于古代荆楚地理的新解,突破了千年来逐步形成的传统解说,作了较大翻案。如果这些新解能够得到确认,那么,将改变人们对荆楚地区历史地理格局的认识,古荆楚地区的历史地图将需重绘。这对于探讨本地区的开发层次、重心所在以及开发规律等方面,都有重大意义。近年来,越来越多的考古成果和自然地理野外考察都进一步证实了石先生的新解。例如:(1)1978年随州曾侯乙墓的发掘,以及最近中国社科院考古所遥感技术中心对随州安居镇的遥感探测结果,都证实了近20年前石先生关于先秦之曾——随实为一国二称,其都城不在今随州市,而在市西的安居镇之地望考定。(2)1980年,由北京大学考古系、武汉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湖北省博物馆组成的联合考古队,对今沮漳河流域进行了详细的考古调查和试掘,证明该流域根本就没有高规格的楚文化遗址和墓葬;(3)1982年至今,三峡考古队

在秭归附近作了大量的考古发掘，证实不仅古丹阳不在今秭归县境内，而且直到西周晚期，该地区仍无楚文化遗存；（4）近年来，考古工作者在今江陵北面纪南城遗址附近发掘了大量楚墓，其高级贵族墓年代最早的也只到战国中期，纪南城址的始建年代，据考古界研究，乃在战国中期后段，证明今纪南城遗址只是战国中晚期楚国的一处具有都城规模的重要城址，但绝不是春秋早期楚自丹阳所迁的楚郢都，二者在年代沿革上判然有别。（5）目前发现的春秋晚期以前贵族墓葬，主要集中在今钟祥以北的汉水中游地区。凡此，都说明石先生关于齐梁以前荆楚历史地理的观点，已逐渐积累了更多的实证。

（二）宋元明清时期长江中游地区的地理变化。石先生在研究先秦至齐梁时期荆楚地理时，还密切关注唐宋以后长江中游地区的地理变化。他常说，研究区域历史地理，眼界、思路自不能仅限于一个历史时期，而应该对各个历史时期加以考察，才可能弄清区域内的开发层次，找出其发展规律。在探讨宋元明清时期长江中游地区地理变化时，他发现垸田的兴起是其中的重要关键。为此，他在讲授中国历史地理专题课时，曾系统讲授垸田的兴起、发展与演变，后来又指导研究生从事这方面更深入的专题研究，分别以江汉平原和洞庭湖区的垸田为题，形成二篇硕士论文。而在探讨垸田发展变化的同时，进而研究开辟垸田的劳动力来源问题，由此又发展到研究明清时期的两湖移民，并由其博士生完成了《明清时期两湖移民》的学术专著（陕西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此后，结合南水北调的需要，石先生与他的研究班子承担了丹江口库区的历史地理研究。此外，他还正在培养一位以宋元时期长江中游历史地理为主的博士研究生。这一领域的研究今后仍具有广阔的学术前景。

（三）中国近代史及中国近代历史地理研究。早在40年代，石先生就开始了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他在由陈寅恪先生指导的硕士论文《中日甲午战争前后之中国政局》（后改题为《甲午战争前后之晚清政局》，由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出版）中，追溯甲午战争爆发前30年的晚清政局，纵论洋务运动与守旧势力之冲突、满人统治者对汉人新兴势力之猜防、宫廷矛盾与朝臣党争三者错综复杂关系，指出此乃导致中国自强运动之失败、甲午战争必败的根源所在；并详述战争期间（1894—1895）清流主战派乘外患日亟、打击李鸿章与淮军将领及中枢之孙毓汶等，同时乘机恢复清流声势并与正在形成的帝党紧密结合，逐步形成朝局的重大变化；指出甲午战争前后的晚清政局实乃19世纪若干重要事变的根源。

近年来，石先生由于承担武汉历史地理研究课题，转而投入到近代历史地理研究，并招收了这方面的博士生。近代中国的时间虽短，但其间的地理变化之巨大甚至超过了过去几百年乃至上千年的历史时期。迄今历史地理工作者，对于近代历史地理作重点的综合研究很少，近代历史地理的研究，不仅是武汉历史地理研究的薄弱环节，整个历史地理学，包括区域历史地理和部门历史地理，都是一个有待开拓的全新领域。石先生以80高龄开辟这一新的历史地理学的研究领域，为历史地理研究向更深入更广阔的领域拓展，指出了方向。

石先生曾慨叹：自己已经80岁了，许多研究项目无法等待自己去完成，只能指导学生去进行。目前最需要做的，是多培养几个年轻人来继承这一新兴边缘学科的教学和科研任务，将老一辈学者的优良学术传统传下去。我们衷心祝愿先生健康长寿、学术之树常青！

（执笔：晏昌贵）

（责任编辑 吴友法）